

羅曼·羅蘭文鈔

Romain Rolland

罗曼·罗兰文鈔

孙 梁 译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Romain Rolland
Above the Battle, etc.

根据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

1916年英譯本等轉譯

罗曼·罗兰文鈔

罗曼·罗兰著

孙 梁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346

开本850×1168 耗1/32 印張8 9/18 插頁2 字数194,000

1957年5月第1版

195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7)0.95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輯譯了罗曼·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寫的論文和日記，以及晚年所著的自傳。崇高的人道主義者罗兰在評論中譴責帝國主義混戰，擁護和平與國際文化交流，給火綫下等反戰小說以高度的評價；在日記中預言美國將成為最後一個帝國主義惡霸，未來的太陽將從東方升起。其中大部分都具有史料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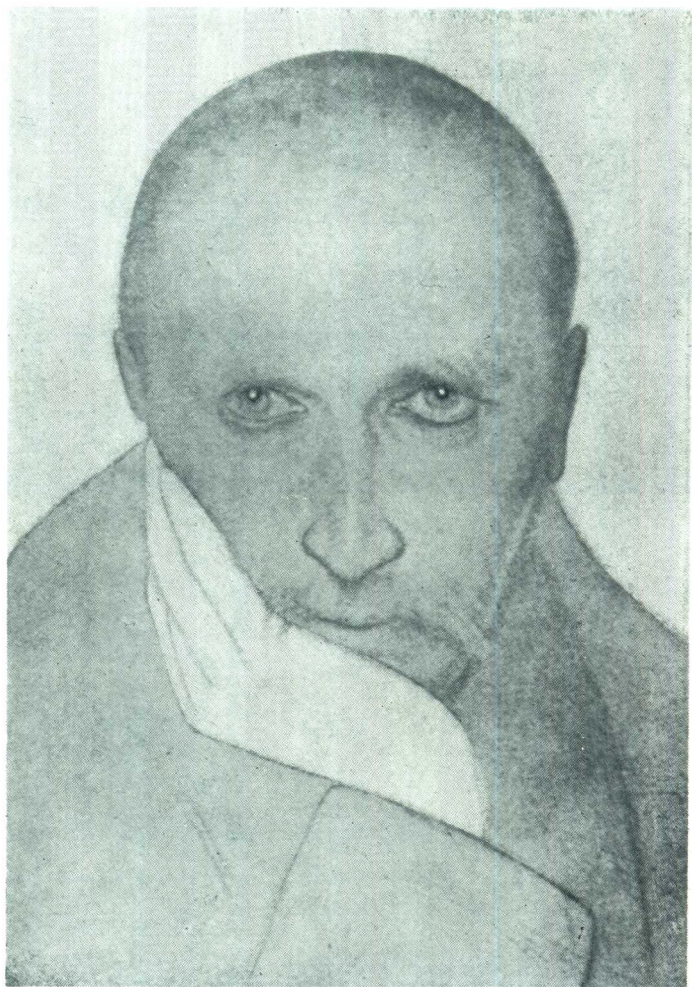
那些散文詩似的回憶錄展示了罗兰青少年時代的精神世界，尤其是他追求個性解放的艱苦歷程。

附錄中兩篇蘇聯批評家的論述對這位不朽的戰士、思想家與藝術家作了精辟的分析。



Romain Rolland

写作“超出混战”时的罗曼·罗兰



60179/14

关于罗曼·罗兰

——代序

現代法國杰出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和文藝批評家讓·弗萊威爾曾經敘述：

羅曼·羅蘭在瑞士發表了一些熱烈擁護和平的文章；他置身於混戰局面之上，要求一切有誠意的人團結起來，以便結束這次殘殺。^①

本書前半卷選譯的論文就是其中一部分。它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陸續發表的。羅蘭在這些評論中痛斥帝國主義屠殺，堅決擁護和平，對盲目犧牲的青年寄予沉痛的關懷，並衷心贊揚新生的蘇聯，呼吁知識分子們團結起來，“趨向一個世界大同的理想，……使歐洲民族跟古老而正在恢復青春的亞洲文明的代表——印度和中國的代表攜起手來。”

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的形勢下，敢於採取這種唯一正確的立場，就需要非凡的見識、信心與勇氣。因為不但統治階級為了自私的利益在驅使人民卷入混戰，而且各國社會民主黨人也背叛了無產階級國際團結的原則，非但不反對戰爭，反而在保護祖國的幌子下，幫助資產階級去挑撥工農大眾互相殘殺^②。同時，從羅蘭的論文中可以看出：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甘願充當統治者的傳聲筒，瘋狂地煽動戰爭，甚至在布登勃洛克家族中描述資產階級世界瓦解的托馬斯·曼都不免^③。而羅蘭就在這窮兵黷武的大風暴中孤立而頑強地舉起和平的旗幟。

他不但議論，而且實踐。追隨着惠特曼的榜樣，他首先參加瑞士紅十字會的救濟機構，為戰俘們和流離失所的老百姓做了不少繁瑣而切實的事情。這種人道主義的言論與行動却惹惱了統治階級。羅蘭遭受到難堪的攻擊。德國方面不必說，即使巴黎大學的教授們也罵他為“叛國之徒”，法國所有的報紙都拒絕刊載他的聲辯，一個政府的走狗甚至編了一大冊書，捏造各種照片與文件，誣蔑他是德國奸細，企圖鑄成冤獄^①，活像今天美國政府在羅森堡夫婦案件中所用的卑鄙伎倆。而羅蘭屹然不動。這種冒舊社會之大不韙的堅定態度顯然不僅是正義感或良心的果實，主要是基於對客觀現實的深刻理解，否則就不能堅持。當然，由於因襲的重負，論文中有時還流露出空泛的精神觀點和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操。但更顯著的是對政治經濟的密切注意和精當的分析。譬如，在“超出混戰”這一篇著名的檄文中寫道：

這是一種千首妖魔，名喚帝國主義，它具有驕橫與主宰的意志，妄想囊括一切、或鎮服一切、或打破一切，除了目空一切之外不肯容忍任何人的偉大。

再如，他在“致各國被謀害的人民”中宣稱：

社會給套上了枷鎖，而攬住那鎖鍊的是普魯特司（希臘神話中的財神——譯者）。它才是各國真正的主子、真正的統治者。就是它使各國成了欺騙的商行、詐取的企業。

同時在注解中道：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金融寡頭對歐洲各國（無論共和國或君主國）的政府掌握着怎樣的權力。

① 法國共產黨的誕生，人民出版社版，第44頁。

② 參閱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第6章，人民出版社版。

③ 見本書“保衛家園”內所引。

④ 斯·茲威格著羅曼·羅蘭傳，英譯本，第305頁。

所有这些都証明羅蘭在悉心研究帝國主义时代的本質，因此他才能在“战时日記”中富于洞察力地撕掉“白宮和華爾街的塔杜夫們”的假面具，看透美國“在指揮一切”，它將統治“歐洲各國政府的合唱隊”，并“扮演主角”。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國开始建立，遭受資本主义國家的圍攻和普遍的誹謗时，又力排众議地声称：“人类的救星是在苏联的一边”，并吁請祖國法蘭西“望着东方！就从那一边將升起未來的太陽……”。这些驚人的預見今天已一一应驗了。

这些論文反映了羅蘭思想演变中一个重要的轉捩点。在这以前，他完成了总结早期思想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到战后，就更積極地投入反战反法西斯的运动中去^①。但是，这些文章中的論点还不是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而形成的。苏联批評家尼古拉耶夫感到那个階段羅蘭思想中触目的矛盾是：他融会貫通了自己祖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的一切文化宝藏，却没有注意到社会科学中最新、最進步的理論——馬克思主义^②。这，一方面是由于出身和所受的傳統教养使羅蘭主觀上不容易接近，另一方面，恐怕是由于当时法國工人运动的混乱与軟弱，使馬克思主义学說不能迅速傳布，傳布了也不易为旧知識分子信仰。在羅蘭誕生（一八六六）的十多年以前，即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工人起义被橫暴地摧殘之后：

法國工人階級运动陷于革命以前的宗派主义，从这混乱之中有兩大傾向开始分道發展着（可以說是）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諸因素。一个傾向集結于布朗基，并無真正的社会主义綱領而目的在于以坚决的少数人的大胆突击夺取政权。較為强大的另一个傾向

① 羅蘭曾与巴比塞联名号召知識分子与工人們反对帝國主义战争，終于在1932年8月召开阿姆斯特丹大会，成立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委员会。見弗萊威尔著：巴比塞，王道乾譯本，第15頁。

② 見本書附錄。

是在蒲魯東的思想影响之下的，想要以設立交換銀行和供給自由貸款之类的空想办法引導工人脫离政治斗争^①。

而到一九一九年左右，即羅蘭五十多歲時，情況還沒有十分改善：

罷工的浪潮泛濫在全國各地。但因為沒有組織健全的革命政黨，所以這種工人階級意識的覺醒，仍不能有行動上的後果。列寧說得好：“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

工人階級一面受着戰前那種不祥的傳統觀念的影響，一面受着無政府工團主義與和平主義的阻撓，不得不在這種極其混亂的情狀下來尋找他們的出路。^②

在這樣的客觀環境中，羅蘭以及跟他相仿的知識分子，非但不易接受當代的先進思想，反而可能造成奧里維對工人運動所感到的那種錯覺，遲遲不能祛除固有的偏見了。

這類偏見在本書後半卷的自傳中表現出許多迹象。作家通過几篇至情流露、悽惻動人的回憶展示了他是“從什麼地方，從什麼時代的深處來的。”這是一種“在悲觀主義的重壓之下度過的”生涯^③。它鮮明地証實了高爾基所謂“資產階級的叛逆者”對於“狹窄的鐵籠里的生活感到絕望的心情。”^④其中比較特出的是羅蘭跟宗教的矛盾。他力求掙脫教會的羈絆，蔑視宗教儀式，而又自稱為“神之子”。這種感情的養成一方面是由於他熱愛的母親是一位虔敬的教徒，而更重要的，恐怕是歷史和社會條件的影響。西歐中世紀時，天主教會不但支配着生活資料與生產手段，操縱着政權，而

① 馬克思傳，羅援南譯本，第355頁。

② 多列士著：人民的兒子，人民出版社版，第22頁。

③ 茅盾演講稿：“魯迅——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中所引羅蘭的自述。見1956年10月20日光明日報。

④ 周揚編：馬克思主義與文藝，第158及160頁。

且壟斷了文化。當時的修道院是唯一的學術園地，教士們掌握着知識的金鑰匙。莎士比亞筆下那位富於智慧的高僧勞倫士就是這種典型的形象。宗教的觸角深入到社會組織的每一個細胞中。因此，流衍所及，它對近代西歐知識分子在智力和精神方面的控制是我們在另一個歷史環境中生長的東方人難以理解的；他們在追求個性解放時碰到的第一道難關也許就是宗教情操。而在法蘭西，這余毒的根扎得很深；別林斯基在一八四七年，即羅蘭誕生前二十年時就談到：

法蘭西是彰明昭著的例子，那里甚至到今天，在開明與有教養的人士中間，還有許多虔誠的天主教徒，許多脫離了基督教的人還頑固地信奉着某種神祇。^①

羅蘭平生的知己、法國著名詩人查理·貝吉是為祖國殉難的愛國主義者，也是誠懇的社會主義者，而至死是一個熱忱的天主教徒。甚至比羅蘭更激進的巴比塞還在耶穌中把那個伽利利人描寫為被剝削的人們的保護者^②。在這種傳統下，在這種氛圍中，莫怪羅蘭不能徹底擺脫宗教束縛了。同時，我們從自傳中看到，他在少年時代深受伏爾泰的自然神論的熏陶；而耐人尋思的是：法國資本主義社會上升期和垂死時的兩位文豪都具有相同的來歷：兩人的父親都是書吏；他們進過同一個中學，受到同樣的古典教育，而結果都走上激烈反抗因襲的道路，雖然前者運用諷刺的鋒芒，後者憑借高貴的热情。此外，我們又看到，斯賓諾莎的泛神論澄清了他騷動不安的性靈，托爾斯泰的鼓勵使他奠定了藝術必須為人類服務的信念。上述一切就是青年羅蘭的精神食糧。

但羅蘭的思想淵源還不止於此。因為斯賓諾莎與伏爾泰的哲學也不可能平地升起，而必有所承受。這兩位生在十七世紀前后期

① “致果戈理信”，別林斯基選集，第780頁，青年近衛軍出版局，1950年版。

② 見巴比塞，中譯本，第35頁。

的學者是祖述了文藝復興的傳統。那位近代唯物論先行者的泛神論(實質上就是無神論)，以及那位人文主義啓蒙思想家對腐朽教會的猛烈抨擊，都是打倒封建貴族勢力、摧毀宗教權威的那個“最進步的變革”^①時代之延續和發展。而文藝復興本身又有其歷史的根源。它恢復了燦爛的古希臘文化，發揚了明朗健全的希臘精神，雖然含有托古改制的契機。而羅蘭正是這兩大時代的崇拜者。他在年青時與梅琛葆的通信中熱烈贊揚文藝復興運動，“景仰它丰沛的活力”，說“那神奇的时代是令人心醉的激情的源泉。”^②又在另一封信中說：“我給希臘藝術陶醉了，四周堆滿了古書和复制品，我沉湎于柏拉圖的著作中，……研究我們共同的友人，那些西西里的哲學家們(指倡言愛與鬥爭為宇宙間原動力的安彼度克里思等——譯者)。”^③ 羅蘭真是和頌贊希臘古瓮的濟慈與中年後遁世于希臘歷史哲學中的席勒一樣，看他如何醉心于那古典時代的文物學藝呵！因此，要探究羅蘭思想的根本，還不能滿足于自傳中提供的線索，而必須根據其他文獻，追溯到歐洲文明的源頭與主流——雅典生活與思想。

希臘國民生活解體後，諸子百家的學說歸結為懷疑派、伊壁鳩魯派與斯多葛派，總稱為自我意識哲學的三大宗派。馬克思曾對它們傾心，因為它們担负着重大的歷史任務，給人類開拓了新的和更廣的境界^④。准此，這些學派必然會予後代思想家以深遠的影響。黑格爾曾指出：“伊壁鳩魯派代表抽象的個別的自我意識，斯多葛派代表抽象的普遍的自我意識……”；從而前者主張“個體的意志自由”，解脫了一切宗教束縛；後者信奉“泛神的獻身于全體”，

① 恩格斯語，科學的藝術論，適夷譯本，第51頁。

② 1890年9月14日函，羅蘭與梅琛葆通信集。

③ 1890年7月26日函，同上書。

④ 以上據馬克思傳，第28及29頁。

所以在政治上成为坚决的民主主义者，而在宗教上則不能擺脫神秘主义的束縛^①。在歷史長河中經過了二千二百多年（在整个人類發展史上却是短暫的階段），這些古代思想還在羅蘭以及類似的文化人意識中播下了矛盾的種子。我們從他的自傳中不是看到他如何頑強地追求個性解放而又無法掙脫宗教桎梏嗎？那些和平論文不是明顯地告訴我們羅蘭如何宣揚博愛和民主精神嗎？一言以蔽之，無論直接或間接，對於古典學術具有深湛修養的羅蘭不可能不受這些傳統思想的影響；因為希臘哲學是歐洲思潮的發源地，它的余波還在今天流蕩。

在這方面說來，可以並不誇張地承認：在文藝和思想的領域內，羅曼·羅蘭是西歐資產階級社會的最后一位鉅子，他總結了歐洲文化中的民主性精華，至少繼承了西歐資本主義社會中有價值的文化遺產，通過艱苦的思想蛻變，成為西歐社會主義文化的先聲，正如但丁綜合了中世紀學術的成果，融會在體大思精的神曲中，成為文藝復興運動的拓荒者一般。而羅蘭的天才特征之一就是綜合性。約翰·克利斯朵夫和歡悅的靈魂中都充滿着高度典型的形象，而創造典型的前提就是綜合的本領，因此他的作品都具有排山倒海、波瀾壯闊的氣魄，著眼於大處，跟瑣碎而機械的自然主義截然不同。他的論著也是如此，大都提綱挈領，絕不流於煩瑣；譬如他在研究生論文“歐洲歌劇之起源”的緒論“音樂在通史上的地位”中說：

我希望讀者會原諒這篇相當簡略的大綱。我只想顯示音樂跟其餘的社會生活溶合到怎樣的程度，從而給這廣博的歷史提供一幅概括的全景。

這寥寥數語就表達出羅蘭對綜合性的觀念了。

① 以上據馬克思傳，第34頁。

当然，跟羅蘭同代的蕭伯納、托馬斯·曼和德萊塞等也都是在各自的方式中达到同等造詣的藝術大師。然而英國戲劇家和德國小說家的主要功績是他們作品中諷刺性和暴露性的意義，在反戰反法西斯、為和平為人民的實際鬥爭中似乎不那么積極。德萊塞在行動上更進一步，在晚年加入了美共，但似乎沒有羅蘭那樣丰厚的學殖。所以作為那個特定時代中歐美進步作家的典型代表而言，也許羅曼·羅蘭是比較恰當的。因此高爾基要熱情地說：“你不只是在歐洲，同時在印度、摩洛哥、美洲，也為人所敬愛，你是被作為一位詩人、導師和勇敢與不屈不撓的榜樣被敬愛着。”①

然而，羅蘭也有他消極的一面，尤其在早期的思想中。那些回憶的片斷組成了一種誠摯的表白，類似盧梭的懺悔錄而真誠得多②。它們顯示了羅蘭早年的思想中存在着不少唯心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乃至神秘主義的色彩，並證明這些因素是在什麼樣的家庭和社会環境中形成的。那是一個壓抑性靈的“地窖”似的家庭，那是一種令人窒息的社会。母親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從小就給“親愛的小曼曼”灌輸了宗教感情，種下了唯心主義的幼芽。而她又是嚴峻而堅強的，為了反抗卑瑣的外省小天地，一定要孩子“在班上得第一名”，後來在弱肉強食、競爭激烈的資本主義大都市中也一定要這“嬌嫩的蘆葦”出人頭地，於是這天生脆弱的少年就不得不奮起全身力量，與“外面吃人的世界”搏鬥；這種“枕戈待旦”的鍛煉意志雖說艱厲，可也使他日後能不顧任何挫折，堅決要完成“命運”的指使，創造自己的事業。③這當然是個人主義，但非少年的過失，而是他熱愛的母親的教養，也非母親的專橫，而是當時客

① 論羅曼·羅蘭，高爾基作，譯文 1955 年 1 月號。

② 托爾斯泰曾說過：“盧梭說了謊——還以為自己講了真話。”（見高爾基論文集中“憶列夫·托爾斯泰”，第 185 頁，蘇聯作家出版社 1955 年版）。

③ 以上所引均見本書自傳部分。

觀現實中必然的趨勢。所有這些都有力地否定了胡風的謬論：“無論怎樣，不能說羅蘭曾是一位個人主義者，不能說他的走向集體主義是‘轉變’。”^① 恰巧相反，我們不必諱言羅蘭早期是個人主義者，而是要探究形成這種思想的根源；從而能認清他是在怎樣劇烈的精神苦悶與思想矛盾中不斷探索真理，怎樣艱苦地逐步扔掉那“穿爛了的個人主義外套”，與勞動大眾結合，獻身於變革現實的戰鬥陣營，終於勝利地走完了“從巴黎到莫斯科”這一段“悠長而艱辛的道路”^②。同時，還須通過周密的探討而肯定：即使在羅蘭早期的思想中，也存在着積極的進步因素，這才能明白為什麼他能轉變。因為任何思想的演化都不可能突然憑空而來，而必有其內在的緣由。就像我們不能割斷歷史一樣，對於一個作家，也必須細心分析他思想中的來龍去脈，才能作出中肯的評價。

在羅蘭轉變立場以前的著作中，無論在約翰·克利斯朵夫或倡導和平的時事評論中，與梅琛葆的通信中或自傳內所追敘的，都流露出追求人格獨立、憎惡庸俗粗鄙的資產階級社會、熱愛正義與自由、憧憬平等合理的大同社會等革命民主主義的崇高精神，正是這些積極思想，在帝國主義混戰、十月革命勝利、法國工人階級運動的蓬勃發展等現實的啓示下，使羅蘭能擺脫偏見，靠近人民，進一步與巴比塞聯名發起反戰反法西斯大會，投入為和平為千百萬普通人的幸福而鬥爭的實踐中，並號召全世界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團結一致，行動起來。

事實上，由於歷史條件的制約，不僅羅蘭，大多數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意識中都存在着複雜的矛盾，因為階級社會本身即是矛盾

① “揭穿胡風反革命集團對羅曼·羅蘭的歪曲”內所引，黃秋云作，譯文1955年8月號，第7頁。

② 以上引句見“從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的道路”，邵荃麟為搏斗所作序言，人間書屋版。

的組合體。列寧說得好：“在每個民族文化里面都有，那怕是不發展的，民主的和社會主義的成分，因為在每個民族里有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群眾，他們的生活條件必不能免地要產生着民主的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①如所周知，過去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和詩人大都是博覽群書、站在當代知識高峰上的巨人；如歌德不但對繪畫有高度的鑒賞力，是眼光敏銳的評論者，而且在色彩學和礦物學上都作出過創造性的劃時代貢獻^②；托爾斯泰不但精通數國語言，每年要用希臘文原本讀伊烈亞特，而且在什麼是藝術和其他論述中對貝多芬、白蘭瑞、雨果和德國古典哲學等都有獨到的見地，雖然不免偏頗些^③。至於羅蘭對歷史和音樂的淹博精深就不用贅言了。在他們求知與深思的過程中，不可能不接受文化遺產中民主性的成分，從而對他們的創作起着深刻的影響。當然，更有決定性的，是階級社會中悲慘現實給他們的刺激，是“事實的教訓”^④，使他們能寫出像小多李、高老头、復活等一面揭露虛偽與黑暗、一面對“下層”人物寄予不可遏止的同情的現實主義作品。同時，由於他們出身與所受傳統教養的千絲萬縷的關係，又不能不沾染唯心主義以及其他消極思想的毒素，造成難以解脫的幻想與偏見，在作品中無法指出明確的變革現實的方向。他們就在这無窮的矛盾中摸索，忠實於生活的終于能靠攏人民，經不住考驗的就流於頹廢，或墮入反動。

在這思想意識或世界觀、生活體驗、以及創作方法的關係上，反革命分子胡風又居心叵測地說：“真實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① 馬克思主義與文藝，第193頁。

② 見安格曼(Eckermann)著：歌德語錄。

③ 見莫特(Maude)著：托爾斯泰傳，和高爾基著：憶列夫·托爾斯泰等。

④ 魯迅：二心集序言。